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长经历、 主要困境及中国贡献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 要] APEC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最大、机制最完善的区域性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历经30多年的发展，APEC已经建立起全方位、多轨道、宽领域的跨区际多边合作机制，在区域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促进全球和平发展与地区繁荣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亚太经合组织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亚太区域一体化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挑战与不确定因素。以亚太经合组织为重要载体与依托，中国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主张与新路径，凝聚亚太经济合作共识，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提升合作效能，推动亚太合作机制在利益契合、规则共识与外部环境方面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关 键 词] 周边外交；国际合作机制；印太战略；CPTPP/TPP；区域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583 (2026) 04-0078-12

[D O I] 10.19643/j.cnki.naer.2026.04.006

[收稿日期] 2026-04-12

[作者简介] 丁 工 (1982—)，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全球治理、中等强国。

APEC已经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覆盖地区最广、纳入成员最多、涵盖领域最大的区域合作框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诞生30多年来，APEC引领亚太地区走在全球开放发展前列，助推亚太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引擎，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1991年11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三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上，根据“一个中国”和“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

济”的原则，中国、中国台北及中国香港三个经济体分别以主权国家和地区成员的身份，一起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此后，中国一直积极、深入参与APEC各领域合作，为历次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占比权重持续增长，中国对地区事务参与的范围热情和水平也在扩大和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日益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立起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亚太经合组织的历史沿革与概况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诞生于全球冷战即将结束的年代，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官方非正式经济合作论坛，最初是由澳大利亚发起倡议随后得到环太平洋两岸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而逐步形成常态化、机制化的多边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秉承和依循自主自愿、共商对策的区域开放原则，已建成深层次、高水平、多角度的泛区域、跨洲际合作机制。^[1]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拥有来自南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四大洲的21个成员，总共包含5个层级的合作机制，其中部长级会议14个、高官层次委员会4个、其他领域和专业工作组15个，涵盖领导人峰会，能源、海洋、教育、网络空间治理和卫生等专业部长会议，财金专员、青年外交官与媒体代表等多个层次级别，关涉工商领袖、民间人士、社会团体和行政部门等不同行业单位和界别领域。亚太经合组织作为本地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级别度最高的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不仅使“亚太”从一个相对模糊宽泛的地理名词实化为具体的地区组织，也推动区域一体化愿景从企划蓝图变成可以实际运作的平台和载体。梳理、回顾APEC的成长脉络和发展阶段可知，该组织的成长历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1989—1992年，萌芽启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逐渐成为潮流。同时，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总值中的比重也持续上升、全球地位明显提高，与之相伴亚太各种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新倡议、新设想不断涌现，影响力与日俱增，区域各国对加强合作、共同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愿望。在此背景下，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波比·霍克访问韩国时，在汉城倡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2]同年11月，由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起总共12个国家在堪培拉举行了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机制的正式成立。1992年4月，在泰国举办的APEC第四届会议上，将部长级会晤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另外，本次会议还确定组建具体的执行机构秘书处，为每年会务活动和处理日常事务提供服务保障工作，并选址新加坡作为秘书处常设机构的驻地。

第二，1992—1998年，飞速壮大阶段。1993年11月，美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年召开一次首脑级峰会并于会后发表共同宣言的模式自此固定下来。199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茂物宣言”，确立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减少成员之间贸易壁垒的宗旨原则。1995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通过的《大阪行动议程》，确定了今后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一般工作规则和具体执行领域，同时还明确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该机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议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进程，危机的受害者开始对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采取慎重态度。亚洲金融危机后，区域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客观环境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各方对产品降税行动的前期承诺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的抬高，也促使各国推行贸易投资开放的意愿下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APEC的发展形成干扰和不利影响。

总体来说，1993—1998年是亚太经合组织重要的成长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会谈议题更趋丰富、内容配置更为充实、组织程序更加完善，并且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增员扩容，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俄罗斯、越南、秘鲁六国先后成为该组织新会员，进一步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数量扩充到21个，成员地缘来源和区位分布形成涵盖北美、拉美、东亚和南太平洋四大板块的多元机制。其间，该组织还发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茂物宣言》，并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引发域内多国经济危机的冲击考验。亚太经合组织度过探索起步阶段开始向纵深内化推进，收缩外延、扩充内涵成为机制重点推进的首要议题，并且各方成员逐步有意识地为即将迈入新世纪进行再摸索性调整，以适应新世纪对机制发展更高水准的现实需要，特别是明确将贸易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作为APEC驱动发展的两个轮子，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入高潮期。

第三，1998—2014年，僵滞成型阶段。TPP、太平洋联盟等多个地区性诸边协定引发区域合作的空洞和泛化问题，导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呈现离散趋向。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APEC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功能和效力逐渐减弱，APEC面临着多样性竞争和不确定性增长带来的巨大挑战，亚太地区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的影响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困扰（如TPP\CPTPP、RCEP等）。^[3]同时，各方未能切实履行前期承诺，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的抬高也促使各国推行融资放开、要素流通的意愿下降，成员对发展多边贸易体系、开放商品劳务流动的态度转向消极。此外，亚太经合组织内设职司机构凌乱，内部力量对比和关系格局变化，发达国家在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中日显乏力，发展中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亚太各国发展不平衡和诉求不一致，内部权力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入。^[4]

第四，2015—2026年，扬帆再起阶段。2014年11月，由中国主办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时隔13年后再次担任APEC会议的东道主。习近平主席主持并出席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出席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还参加了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多场会见洽谈，就加强双边关系、深化国际合作等有关事项共话友谊、交流想法。此次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希望以“多规合一”来打破自由贸易协定，过于碎片化带来的“意大利面碗”困境。^[5]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亚太地区机制框架内存在多个纤维交错、相互缠绕

的次区域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安排，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APEC的效率低下和恶性竞争^[6]，还对区域内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构成较大的冲击。因此，将FTAAP从理想愿景推进到实际行动，并尽快完成自贸区建成目标是2014年APEC北京会议的最大亮点。

概括来说，亚太经合组织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范围涉及环太平洋地区，促成均衡的全球经济分布格局。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区域性、政府间和最高层次的合作组织，APEC既是环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力和广泛性的多边经济合作论坛，还是首个联接太平洋两岸多个成员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它的诞生和发展填补了世界三大地缘经济板块（西欧、北美、亚太）中亚太地区没有高层次区域组织的空缺，也与国际地区合作的趋势和潮流相契合。二是APEC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APEC在过去的37年里逐步构建起相对健全完备的地区合作框架，依循多元并蓄、兼容并收、均等普惠的开放包容精神推动地区经贸和科技合作，在特殊情况下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反对恐怖主义、能源与粮食安全也是重要的讨论话题。现今在APEC平台内，区域国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联手国际反腐败、流行性疾病防治等又成为新的研讨项目，这为今后相关国际体系的构建和最终成型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制约因素和现实困境

尽管亚太经合组织取得了辉煌成绩，显著改善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水平，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亚太区域内多重竞争、复杂博弈上升导致被塞入许多地缘政治热点和战略安全敏感议题，非贸易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议题的“渗入”使APEC发展轨道呈现背离成立机制原始初衷的倾向。^[7]由此可见，亚太经合组织处在发展战略的十字路口，正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制约因素和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太”地缘概念的相继出炉与亚太区域再定位的模糊化加剧。亚太通常是指东北亚、东南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上的各岛屿。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将势力扩展到太平洋，先后占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中途岛、塞班岛，一直标榜为亚太国家。一般来说，亚太地区不包括太平洋东岸北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部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后，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先后加入该组织，从而以机制化的形式表明自身亚太国家的属性，标志着亚太地缘范畴实质上已经延伸到太平洋东岸。而与此同时，不仅一些南太平洋地区岛国表达靠拢亚太经合组织的想法，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也展现出融入亚太经济圈的强烈愿望。随着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在经济、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联系加强，不仅使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燃起更加强烈地融入亚太区域合作的冲动，也意味着“广域亚太”的地缘概念正在从太平洋两岸

向环印度洋区域延伸和演进。

事实上,“印太”原本是地理科学中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泛指从西太平洋途经北印度洋直到非洲东海岸的环形片区,只是由于地缘政治元素融合、渗透进“印太”地质板块学科中,从而不仅使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构建起逻辑关联,还赋予其更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虽然将印度洋和太平洋统联成一个地缘战略整体并非美国的首创,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高度重视与推动作用,“印太”概念难以产生剧变性效果。^[8]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开启亚洲外交行程之际,正式以“印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传统习惯上的“亚太”说法,宣布“印太”战略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印太构想”进行全面阐释时,明确指出印太地区是“从非洲海岸到美洲海岸”的“自然区域”。^[9]当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深化,推动南亚与亚太的地缘角色与战略地位形成相互拉抬、彼此促动之势,而“印太”与“亚太”地缘范畴趋于交融,也迫使亚太地区重新审视地缘边界所在与区域利益范畴所系的契合点,从而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区域和功能定位构成冲击。

第二,亚太地区是世界上贸易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虽然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要特点仍是以双边自由贸易合作和次区域多边贸易机构为主,这种碎片化、模块化的区域集团格局严重稀释APEC机制的高聚同度和强粘合性,导致周边区域制度安排呈现多、乱、散、杂的景象,跨太平洋泛区域的自由贸易体系尚未形成气候。当前,这种嵌套式的多边主义已经在地区层面上得到发展,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该地区的国家会同时参加各种多边组织。例如,1989年APEC成立时,亚太地区仅有8个FTA,到2018年迅速增加到180余个。诸多APEC成员热衷于加入FTA,既是WTO多边贸易体制遇阻情况下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次优选择,也是竞争性自由化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直接体现。^[10]

美国曾经是FTAAP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原本想通过与东亚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构建亚太大市场来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对冲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但美国出于对东亚合作机制排除自己、损害自身主导地位的担心,却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没有中国参加、当时由其主导的TPP上。2010年3月,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8国参与谈判。此次谈判涉及农产品关税、国有企业竞争、非关税壁垒、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和人员移动等政策议题。随后2010年10月,马来西亚正式加入TPP,成为第9个谈判国,TPP进入“P9”谈判时期。2011年11月,美国宣布“P9”协议的纲要性政治文件已经谈判完成,拟进一步磋商实现法律议案的签订,此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又加入到谈判中来。

而在拉美地区,美国推动TPP谈判期间,拉美区域一体化也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相继涌现,并形成看法主张和宗旨原则态度迥异的两大集团。一个是政治上自由、经济上开放的太平洋集团,以太平洋联盟为典型代表,该集团以自由贸易为抓手,以共同市场为方向,以实现商

品、资本、人员和服务要素的自由流通为最终目标的利益取向非常显著。另一个是政治上左倾、经济上保守的大西洋集团，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主要标志。该集团因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一体化进程踟躇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合作进展。^[11] 区域国家加速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来对接 TPP 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加入谈判会削弱 APEC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引领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亚洲国家不看好 APEC 作为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载体作用。

对美国总体而言，最初 TPP 具有重要的政治安全利益和经济外交价值。从政治层面看，美国介入 TPP 的过程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出炉几乎是同步展开。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国希望通过 TPP 这一合作机制，从而逐步掌握世界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但如果美国力推 TPP 是想分享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和红利，只是基于这种单纯的防御目标，那么按照过往的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美国的优先选择应该是加入到现行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之内，沿用成熟机制勿需翻新续建、另起炉灶创建另一套体系。但如果从亚太战略布局角度观察，就不难理解美国最初主推 TPP 的真实用意在于排斥与遏制中国。2017 年年初，特朗普上台后立即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 TPP。在日本、澳大利亚的斡旋下，其余 11 个国家经过再次磋商，调整了 TPP 中的部分条款与承诺，并于 2018 年签署了“缩水版”的 CPTPP。2022 年拜登上台后启动 IPEF，力图削弱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维护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12] 目前，亚太地区 CPTPP、RCEP 以及 IPEF 影响力最大的协定或合作框架并行，三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竞合博弈关系，CPTPP 不包括中国和美国，主要由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动形成；RCEP 由东盟“功能性”主导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发起 IPEF 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排斥中国影响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区域原有的合作秩序。^[13] 如果最终亚太区域协定是由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组合而成，FTAAP 作为亚太共同自由贸易框架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而集中缔结的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又将大大加重亚太地区的“面条碗”效应。^[14]

第三，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重。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在亚太事务上“一超独霸”的区域盟主。然而，中国在大国群体中的异军突起，导致“守成大国”和“新起大国”在周边相遇相撞的概率陡然上升。^[15] 尽管中美关系既不是“非敌即友”“非黑既白”的对位结构，也不同“彼失偶得、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但由于二战后国际体系中霸主与二号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以致美国转向全力防止中国崛起对其西太平洋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政策。^[16] 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联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盟国，以及新加坡、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伙伴国家拼凑亚洲版“小北约”，以此构建围堵、遏制中国崛起的共同阵线，达到削弱中国区域影响、迟滞中国发展进程和崛起上限的目的。

在东北亚，鉴于韩国是美国同盟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美国借口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计划”，加紧推动美日、美韩两组同盟关系向美、日、韩三边同盟转变的进度；在东南亚，美国妄图利用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争端挑拨离间，通过拿南海说事和打航行自由牌来扮演南海问题的“裁判”，

以此抹黑和炒作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当合法的维权主张。美国奉行台面上不持立场、客观中立的表象，暗地里偏袒帮腔菲律宾、越南等国，美国还利用各种机会场合，促请怂恿印度、日本、东盟、七国集团、欧盟甚至韩国等友好国家或盟邦出面发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仍称中国构成“最严重系统性挑战”，国家安全报告则称中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还出现“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的提法。归根到底，美国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表明美国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地缘冲击和压力。鉴于特朗普过往的政策立场和现实的价值倾向，美国可能继续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再加上其曾对华使用“极限施压”和“长臂管辖”的手段，美国极有可能会在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不断对华加码施压，致使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因此，无论特朗普之后未来谁执掌白宫，美国仍旧会承袭、延续以对华遏制为主基调的战略。哪怕期间出现类似中东局势动荡升级，美俄在东欧、黑海、外高地区对峙加剧等额外事件，美国依然会“不受干扰”、雷打不动地推进“印太”战略，并将继续推动中美竞争博弈趋向白热化，导致大国对抗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亚太地区。

三、亚太合作视域下的“中国贡献”与“中国策略”

亚太地区是中国周边的首善之区和起航之地，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既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周边外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力点和支撑点。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后，便将地缘身份定位为亚太国家中的一员，始终坚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贡献力量。过去30余年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既是APEC合作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是重要的支持者和贡献方。一方面，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成员最多的区域合作形式，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积极融入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促进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区域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时空宽广的战略性、宏观性论坛，不随意将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等议题纳入市场开放谈判的讨论范围，它所秉持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的运行方式，符合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导向和国际处境。中国也正是利用这个灵活的平台有效推动了自身的开放，将其视为1992年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机会之窗。党的十六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文件在部署多边外交方略时，均重点提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等中国深度参与的全球及区域多边治理平台与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在APEC合作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和引领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成员方。中国还是亚太经济技术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亚太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自加入该组织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历次领导人会议，中方各级主管机构全面参与了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专题工作组等具体合作活动，对APEC的合作和发展方向提出了积极的倡议和主张，为亚太区域的合作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2014年11月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上，中国作为主办方推动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

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为 APEC 与 FTAAP 平行推进模式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已经形成相互映衬、彼此点亮的格局。

第一，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构建亚太和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中国官方文献中首次出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在 2011 年 9 月出版发行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上，该书提到“各国应以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观点、新视角，来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多边场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巴、亚洲、周边、亚太、中非、中拉、中阿，以及海洋、网络空间、核安全和卫生健康等，涵盖区域、国别和全球公域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性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益清晰。^[18] 2013 年 10 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巴厘岛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议。自此以后，习近平主席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呼吁各方坚守亚太经合组织创立初衷，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19] 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命运共同体相互呼应、协同推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致力于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步平台和前进基站。^[20]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重要演说时，谈到“我们要团结亚洲各国并肩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结成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21] 2015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巴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22] 中国政府还向亚洲和世界阐明了努力实现“中国梦”与“亚洲梦”“世界梦”相融相通、紧紧相连的提案和倡议。^[23] 亚太既是全球最活跃的多边外交中心之一，也是新中国首次在多边外交舞台的亮相之地，并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和对亚太事务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构成互为条件、彼此依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依托亚太经合组织构建命运共同体，不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构架，也使亚太命运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还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地和必由之路。

第二，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运筹大国与经略周边“双重点”外交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国周边境内的亚太地区汇聚了世界前 15 大经济体中的 9 个，既有中国这种举足轻重的新兴崛起大国，又有一个在地域概念上不属于中国周边地区，但海外军事领属遍布世界各地、宣称跟所有国家都“接壤”的超级大国，也有积极进行投棋布子的传统大国俄罗斯和日本，还有正在大举进军东亚的侧翼

大国印度。^[24]从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格局构造看,该地区既有二战残余、冷战积怨和海上争议等多重复合的矛盾,也有中、俄、印新兴崛起势力和传统守成势力在经济治理领域的博弈,还有中、美、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政治方面应对日、印“冲常”联盟的挑战。因此,增进与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周边大国合作与互动的强度,不仅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现实需要,更是把握时代主题趋势脉络的战略性课题。目前,在影响亚太区域局势演进的相关指标上,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关系互动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国家行为体,中、美既都拥有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和海军力量,也都有着最齐全、完善的产业体系和经济部门,既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又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国家,还是世界上发表科研论文、高等教育学生和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25]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各成员轮流主办,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为各国沟通和协调立场观点提供了有效的平台。APEC会议期间不仅是多边领导人会议,而且包括领导人之间的双边商谈机制,在双边和多边两个对外交往维度上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APEC历来既是多边会谈的世界舞台,也给双边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事实上,自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非正式领导人会晤,就为中美两国元首直接见面提供了良机,发挥起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APEC为中美两个大国开展首脑外交创造了直接的机会,从而有助于两国亲和大国关系、增进私交情谊,成为中国处理复杂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是中国还需要采取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推动中日互惠合作,将周边事务作为着力点充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议题内容,与印度一起探索构建“竞合并存”的新型发展中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虽然始于中美关系但并不仅限于中美两国,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日本、印度和欧盟等会继续追随与迎合美“印太战略”,但也存在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强化自身价值,而进行政策回调以适度同美国拉开距离的可能。2025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就表示将基于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大方向,与中国进行各个层面的沟通。

另外,印度投身于被认可为一个全球关键参与者的努力,持续深化和扩大同东亚、甚至南太诸国的伙伴关系和多边交往。再加上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一些国际机构甚至预测,印度2027年经济总量可能超越日、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无疑是印度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既会极大地激励印度在亚太获取更大影响力的努力,也将会推动印度外交更加追求战略自主。此前,印度在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结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中,在保持与美国积极互动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同中国、俄罗斯的战略沟通,努力确保和强化自身能够在区域格局中扮演独立一极的角色。^[26]总之,以亚太区域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平台,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协调大国关系、经略周边的重要依托,有益于中国妥善处理与全球性重要经济体的关系,还可以做足做实“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经济意涵。

余 论

对于国际合作机制来说,成员利益偏好、共同规范与国际社会环境三者的互动过程,将会对机制的形式、内容和价值取向等基本特征产生重大影响。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协商交流的政府间组织,达成的协定、通过的决议不承担任何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契约义务,其发展规划纲要产生的利益偏好效应很难落实到位。同时,亚太经合组织仍然遵循现存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并未形成独立的“新发展观”和真正有价值观念的国际制度创新,需要加强在促进全球合作治理与互利共赢方面的理念建设,需要有共通价值和共同规范安排。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未来需要深化内部机制建设,推动更多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理念和成果,进而克服约束力和执行力偏软的弊病。另外,亚太经合组织不可能总是维持成员固化的状况,“扩员”将是大势所趋,但成员“扩大”的路径选择问题却带来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亚太经合组织从机制外部加强与其他全球及地区性多边机构的战略对接和联系协调,可以通过“亚太+”模式邀请区域相关机制代表参会,形成“APEC+南太岛国”“APEC+太平洋联盟”“APE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相关区域机制互动的格局,以进一步彰显亚太经合组织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总之,亚太经合组织应该从机制内部深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延续以内化固本强基与外向联动兼顾的方式提升合作效率,进一步促成国际合作机制利益偏好、共同规范与外部环境的正向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肖成红



参考文献:

- [1] 宫占奎,于晓燕. APEC发展进程分析及未来展望 [J]. 改革, 2014 (11): 5-16.
- [2]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概略简介 [EB/OL]. [2026-03-01]. <http://zh.wikipedia.org/wiki/>.
- [3] 文 洋. TPP投资规则—内容、挑战及中国的因应 [J]. 国际贸易, 2016 (2): 48-54.
- [4] 王晓文. 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现实挑战与未来路径 [J]. 当代世界, 2025 (11): 22-27.
- [5] 宫占奎. APEC与FTAAP平行推进问题研究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 15-26.
- [6] 刘宗义.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 (4): 40-53.
- [7]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叶海林. “印太”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8 (2): 1-13.
- [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EB/OL]. (2018-06-01) [2026-03-01].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 [10] 刘晨阳. 亚太经合组织30年: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回顾与展望 [J]. 当代世界, 2019 (11): 4-10.
- [11] 湛园庭,冯 峰. 拉美三国加入TPP的地缘政治解读 [J]. 当代世界, 2016 (4): 66-69.
- [12] 原幅力,于倡浩. 印太经济框架背景下中国对APEC国家汽车出口对策研究 [J].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5 (2): 79-92.
- [13] 盛 斌.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共同愿景到多元博弈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6 (2): 9-26.
- [14] 唐国强,王震宇. 亚太自由贸易区一路线图与优先任务国际问题研究 [J]. 2015 (1): 75-87.
- [15] Enrico Fels. Shifting Power in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Sino-US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Middle Power Allegiance [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 [16] Ely Ratner, "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6, No.2, 2013, p.1-38.
- [17] 陈须隆.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全球共识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12-28 (1).
- [18] 丁 工. 新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 [J]. 新湘评论, 2023 (5): 42-44.
- [19] 丁 工.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开年外交的主题词 [N]. 中国民族报, 2017-2-10 (6).
- [20] 许利平. 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合作基础及发展前景 [J]. 人民论坛, 2025 (21): 72-75.
- [21] 习近平. 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 [EB/OL]. (2014-07-05) [2026-03-0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5/c1024-25241720.html>.
- [22] 习近平. 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 [EB/OL]. (2015-04-22) [2026-03-01].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04/22/c_134172435.htm.
- [23] 杨洁篪. 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7-1-14 (1).
- [24] 丁 工. 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 (7): 24-41+156-157.
- [25] 沈大伟. 中国的世界梦—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4 (4): 105-108.
- [26] 祁怀高. 大周边外交可重点营造支点国家关系 [N]. 国际先驱导报, 2015-12-31.

APEC: Its Development, Major Dilemmas, and China's Contributions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is the regional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ith the highest level, most extensive, most influential and most well-established mechanism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PEC has built an all-round, multi-track and wide-ranging cross-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ts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has been increasingly enhanced,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Although APEC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With APEC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support, China has put forward new visions, propositions and paths for 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onsolidating consensus on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mproving co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form a positive virtuous cycle in terms of interest alignment, rule consensu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do-Pacific Strategy"; CPTPP/TPP; Regional integration